

## 探寻民俗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立场

### ——“方法论与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沙红兵

2012-1-31 22:56: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近期,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州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方法论与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30多位在民俗文化研究领域卓有声誉的学者与会,通过有关论文的宣读、点评和讨论,就民俗文化范畴、研究方法、学术史以及民俗文化研究的中国立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诗经》以降,俗文学、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元以来,其成为文学史、文化史的重要线索,新文学运动后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史、文化史的主流。但什么是俗文化?什么是俗文学?民间文化、民间文学、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等各有哪些特定内涵,相互间有何区别和联系?长期以来,这些问题缺乏基本的理论反思和学术梳理,制约着相关研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义在《俗文化的本质与功能》中,力图系统地梳理和把握相关概念,着重分析了俗文化的本源性和结构性功能、俗文化与文学、俗文化与历史、俗文化与哲学、俗文化与民族记忆、俗文化与人群生存方式等问题。他认为:“俗文化以其文化发生学上的本源性和文化结构学上的基础性,以丰富的维度联通了文学、史学、哲学,还有宗教学,联通了人类的日常生存状态,它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它是一个浑浊的文化源泉,一条泥沙俱下的滚滚洪流,研究者临川浩叹之余,应负起任重道远的担当,从混有糟粕中提炼出精华,从夹杂腐朽中点化出神奇。”

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旷思凡提醒民俗文化研究者,应注意电视新闻、广告、报纸、杂志乃至宣传广告牌中的“核心图面”,这些图面在被感知的空间和时间的顺序中组成一个动态秩序,对我们的世界感知、后工业时代“自我”和“他人”的建构均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开廓对俗文化、俗文化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广州大学教授刘晓明在《我们是如何认识一张桌子的?》中,将现象学、哲学人类学的现代眼光与中国传统戏曲《三岔口》结合,使传统戏曲中向来不受注意的道具“客体”焕发出耳目一新的学术光彩。

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现代学术的文献视野被大大拓宽。随着西方现代人类学的输入,田野调查在今天已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过程和手段。随着汉学研究视阈的扩展,所谓“域外汉学”也成为晚近十几年来长足发展的重要学术方向之一。这些学术走向给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陈益源在《文献与田野结合之必要性》中,以越南顺化关公祠为例,对关帝信仰在越南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实地田野调查,力图弥补书面文献、金石材料或现存书籍的不足,以更准确和完整地记录、还原越南关帝信仰的历史真相。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则结合《子弟书全集目录》的编辑整理过程,介绍了远足台湾、日本进行田野调查的甘苦与收获。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自信的逐步提高,在文史研究领域要求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笼罩和束缚,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内在脉络出发研究中国文化的呼声日趋强烈。多年前,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曾永义就曾提出,中国民俗文化有自己的内在特点,无须比附西方理论和观点。这一学术要求和趋向也在本次研讨会上得到体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王小盾在《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中,对美国梅维恒教授等学者在研究变文、白话小说时所提出和应用的民俗文化(文学)研究的理论模式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东亚历史已绵延五千年,汉文化的传播意义重大。其造就了三种形态的汉文化区:未完成的汉文化区(朝鲜半岛、日本列

岛、越南北部)、趋向完成的汉文化区(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成熟形态的汉文化区(北方方言区、南方方言区)。如果我们站在第二个汉文化区——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立场上观察,可在未完成的汉文化区中看到它的过去,也可在中国内地各南方方言区看到它的未来。某种意义上,高丽俗乐问题可作两种理解:可理解为中国音乐向朝鲜半岛传播的问题,也可理解为汉文化区内雅俗文化之转化的问题。也可以说,中国及汉文化区的俗文化研究,完全可以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区域视野。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自2008年底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受到了与会学者和同行的高度评价。它对于如何检讨几千年来特别是最近一百年来雅俗文学/文化互动消长的利弊得失,对于如何结合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产业、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后现代文化研究等学术探索成果,最终形成中国俗文化研究者自身的问题意识,都将具有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 钟义见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010-65280234, 65287978

Email: skw01@cass.org.cn 京ICP备05072735号